

历史学理论辑要

梁寒冰编

下

中华书局

1982年·北京

第七章

革命与战争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述辑要

【内容提要】

马克思认为,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清楚地表明,他和恩格斯关于生产力与社会关系联系的观点,是正确的。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

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初的薪金是从古代军队中发展起来的;古代罗马士兵的个人财产,是承认非家长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古罗马的军事工匠公会 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规模地运用机器也是从军队首先开始的;金属的特殊价值和它作为货币的用途,最初也是以它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军队内首先实行的。

恩格斯认为,暴力不是单纯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较完善的工具战胜较不完善的,例如手枪战胜利剑。工具是生产出来的。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具即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是以“经济力量”、“经济情况”为基础,是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目前的暴力是陆军和海军,是需要“巨额的金钱”的。暴力不能铸造金钱,最多只能夺取已铸造出的金钱。金钱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才能取得,因此,暴力是由经济情况决定的。现在的陆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不论装备、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因此,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份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十四世纪初,火药经阿拉伯人传入西欧,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但是,火药与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即经济的进步。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二者又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团归于尽了。随着市民等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越来越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工程部门。

军队的全部组织、作战方式和战争胜败,都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两种材料,即取决于居民的质量和技术。一旦技术进步用于军事目的,往往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的改变甚至变革。石制的、青铜的、铁制的武器,盔甲、骑术、火药以及线膛枪与火炮,在战争中造成巨大的变革。不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装备是基础,它直接取决于生产发展阶段。

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
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
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薪金最初就完全是在古代的军队
中发展起来的。同样，罗马人的Peculium Castrense〔军营里的财
产（指古代罗马人军营中的士兵的个人财产）。——原编者注〕是
承认非家长的动产的第一种法律形式。fabri〔古代罗马人军队里
的作业队或军事工匠。——原编者注〕公会 是行会制度的开端。大
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甚至金属的特殊价值
和它作为货币的用途，看来最初（格林石器时代以后）也是以它
在军事上的作用为基础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
实行的。此外，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
史。

马克思：《致恩格斯》（1857年9月25日）。《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第29卷，第183页。

……总之，手枪战胜利剑，即使最幼稚的公理论者在这里也应
当明了，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要求促使意志行为实现的非
常现实的前提，特别是工具，其中，较完善的战胜较不完善的；其
次，这些工具必然是生产出来的，同时也可以说，较完善的暴力工
具即一般所说的武器的生产者，战胜较不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
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
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
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目前，暴力是陆军和海军，而我们大家遗憾地知道，这两者需
要“巨额的金钱”。但是暴力不能铸造金钱，它最多只能夺取已经铸
造出来的金钱，……因此，归根到底，金钱还必须通过经济的生产
才能取得；就是说，暴力还是由经济情况来决定，经济情况供给暴

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但是还不仅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前提。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天才统帅的影响最多只限于使战斗的方式适合于新的武器和新的战士。

在十四世纪初,火药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但是火药和火器的采用决不是一种暴力行为,而是一种工业的,也就是经济的进步。……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的作用。要获得火药和火器,就要有工业和金钱,而这两者都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随着市民等级的发展,步兵和炮兵愈来愈成为决定性的兵种;在炮兵的压力下,军事行业不得不增加新的纯粹工业的部门——工程部门。

……这个教训是:军队的全部组织和作战方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胜负,取决于物质的即经济的条件:取决于人和武器这两种材料,也就是取决于居民的质与量和取决于技术。……我们在上面已经逐步地看到,一旦技术上的进步可以用于军事目的并且已经用于军事目的,它们便立刻几乎强制地,而且往往是违反指挥官的意志而引起作战方式上的改变甚至变革。此外,战争的进行对自己后方的和战区的生产力和交通工具依赖到多大程度,关于这个问题,现在每一个肯用功的士官都能够向杜林先生讲清楚。总之,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是经济的条件和资源帮助“暴力”取得胜利

利,没有它们,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

恩格斯:《反杜林论》(1877—1878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81—187页。

暴力,即陆军,是用什么来维持的呢?用**金钱**。就是说,立即又取决于生产。比较一下雅典的**海军**和**政治**(〔公元前〕380—340年)。对同盟国采取的暴力,由于缺乏物质手段去进行长期的和有效的战争而失败。英国的通过新型大工业创造出来的补助金打败了拿破仑。

……有组织的暴力首先是**军队**。没有任何东西比军队的编成、编制、装备、战略和战术更加依赖于经济条件了。装备是基础,而它又直接地取决于生产的阶段。石制的、青铜制的、铁制的武器、盔甲、骑术、火药以及大工业通过后装的线膛枪和火炮在战争中所造成的巨大变革——这些枪炮都是只有大工业用其等速工作的并且生产几乎绝对同样的产品的机器才能制造出的产品。编成和编制,战略和战术,又取决于装备。战术还取决于道路的状况——耶拿会战的计划和成就在当前公路的状况下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还有铁路!因而,正是暴力比其他一切都更加依赖于现有的生产条件,这一点甚至耶恩斯上尉都清楚地看到了。

恩格斯:《〈反杜林论〉的准备材料》(1876—1877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7—684页。

(二) 列宁论述辑要

【内容提要】

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道路发展的,必须善于估计最复杂最离奇的曲折道路。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曲折道路和对妥协的态度实质上是一样的。因为任何曲折的历史转变都是妥协的,即是已经没有足够力量完全否定新事物的旧事物同还没有足够力量完全推翻旧事物的新事物之间的妥协。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绝对否定妥协,也决不排斥反妥协的斗争。马克思认为,革命时期并不是脱离“正常”轨道的“社会病态”的表现,而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生气、最重要、最本质、最具有决定性的关头,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无产阶级必须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和平的”缓慢的时期,以加强先进阶级的意识和战斗力量;另一方面,要把它引向先进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使之能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完成伟大的任务。

小资产阶级,由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常遭受压迫,生活突然下降以至破产,因此很容易产生极端的革命狂热性,不论什么妥协都一概加以反对。这简直是难于认真看待的孩子气。有各种各样的妥协,要善于分析每一种妥协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条件,学会区分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减少强盗所能加于他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捉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赃。

俄国革命的经验证明一个真理: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没有促使这种情绪高涨的条件,革命的策略是不能变为行动的;但是,决不能只根据革命情绪来制定革命策略,必须客观地估量国内外

一切阶级的力量，参照许多革命运动的经验。要战胜较强的敌人，不仅要尽最大的努力，还须极精细谨慎和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争取大量的同盟者，尽管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革命形势，不可能有革命；但不是任何革命形势，都将引起革命。一般说来，革命形势的特征是：一、统治阶级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上层”的政治危机给被压迫阶级造成一个爆破的缺口。只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是不够的，还须“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二、被压迫阶级的贫困和灾难异乎寻常的加剧；三、群众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在和平时期忍气吞声受人掠夺，动荡时期的危机形势迫使他们进行独立的历史性的发动。没有这些客观变化，按照一般规律，革命是不可能的。

农民运动按其社会经济内容来说，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它不反对商品经济和资本，只反对旧的农奴制关系，特别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是不会铲除资本主义的，相反地，它会给资本主义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目前，俄国农民要求土地和自由。如果他们获得最充分的自由，推翻地主官僚统治，剥夺地主土地转归农民所有，那么，既不会消灭商品经济和农民的个体经营，也不会消除富农和雇工、短工之间——亦即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相反地，地主被消灭得越干净，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越加深。彻底消灭一切农奴制残余，推翻地主官僚政权，建立民主社会制度，并不能消灭社会划分为阶级的现象，也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土地革命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社会民主党应坚决地予以支持，甚至对“土地平分”也决不拒绝给予支持。必须懂得民主

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在民主革命时期,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只有争取最完全的自由,领导农民彻底地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才能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巩固起来,为社会主义斗争提供良好的条件。农民和无产阶级可能是资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动力;农民只有跟着无产阶级走,才能争取民主革命的完全胜利。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对资产阶级是有危险的,因为无产阶级可以利用争得的自由反对资产阶级。因此,资产阶级出于自己的阶级利益,总是期望民主革命半途而废,与旧政权勾结起来反对无产阶级。

只有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才能给社会主义革命打开门户。一九〇五年的俄国革命已经显示出,大多数农民不论村社社员或单独农户,都赞成一切土地收归国有。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土地私有制已被废除,土地国有制业已实现,从而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良好基础,同时也造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灵活的土地制度。从资产阶级民主观点看来,俄国革命农民已经走到尽头,因为从这种观点看来,比土地国有与平均使用土地“更理想”、“更激进”的办法是不可能有的。只有布尔塞维克才帮助农民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真正进行到底,才促进和加速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上的平衡发展是不可能的,除工业中的危机和政治上的战争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可以恢复遭到经常破坏的均势。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绝对规律,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获得胜利的无产阶级在本国剥夺资本家,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反对资本主义世界,吸引这些国家的被压迫阶级发动起义,必要时甚至以武力反对剥削阶级及其国家。

内战比其他任何战争都更严重、更残酷。国际战争总是以有

产阶级之间勾结而告结束，唯有在内战中被压迫者集中全力彻底消灭压迫阶级，消灭其存在的经济条件。所谓革命是极端残酷的阶级斗争，必须承认同有产阶级斗争是所有革命中最残酷的斗争。由于革命把先进阶级推向前进，即使遭到失败，它也是胜利的；法国革命虽然被粉碎，但它毕竟是胜利了，因为它奠定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基石。一切革命阶级为争取胜利，实现自己的历史任务，必须善于掌握社会活动的一切形式或方面，必须时刻准备最迅速地以一种斗争形式代替另一种形式。如果一支军队不想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那么，谁都会认为，这种做法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这一点对于政治比对于军事更为重要。倘若不掌握一切斗争手段，当其他阶级状况发生变化时，我们就会遭到极大的失败，甚至是决定性的失败。

战争和国内阶级斗争有必然的联系，不消灭阶级和建立社会主义，是不能消灭战争的。被压迫者反对压迫者、奴隶反对奴隶主、农奴反对地主、雇佣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是有其合理性、进步性和必然性的。我们必须历史地研究各种战争。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战争，它们虽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种种惨祸、暴行、灾难和痛苦，但它们仍然是进步的战争，它们促进人类历史的发展，加速破坏极端有害的反动制度，破坏欧洲最野蛮的专制政体。因此，必须研究这一战争的历史特点。

法国大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从一七八九年起至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止，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的战争是各种战争类型中的一种。这种战争的主要内容和历史意义是推翻专制制度、封建制度和异族压迫。这种战争是进步的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资产阶级由进步转为反动，由反封建的民族解放者变为各民族的最大压迫者。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这场战争是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是为瓜分殖民地、巩固“大国”对异民族压迫和保存产

奴隶制而进行的战争。

熟谙军事问题的作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争是政策的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探讨每一战争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是按照这个观点考察各种战争的。英、法、德、意、奥、俄等国政府数十年来，实行掠夺殖民地、压迫异民族和镇压工人运动的政策。一九一四至一九一五年的战争正是这一政策的继续。相反地，在中国、波斯、印度和其他附属国里，却可以看到亿万人民的民族觉悟和要求摆脱反动“大国”压迫的政策。中国等国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战争，仍然可能是资产阶级进步的民族解放战争。

按照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战争可以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也可以转化为民族战争。例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战争是民族战争；但是，当拿破仑建立了法兰西帝国，奴役欧洲早已形成的民族大国之时，法兰西的民族战争就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这种帝国主义战争，又产生了反对拿破仑帝国的民族解放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帝民族战争能否导致帝国主义战争，取决于许多情况；即使在欧洲，也不能认为民族战争在帝国主义时代不可能发生。

怎样识别战争的“真正实质”呢？要研究导致战争的政策。如果政策是保护财政资本的利益，掠夺和压迫殖民地和其他国家，那么，由这种政策产生的战争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如果政策是推翻异族压迫，争取民族解放，那么，由这种政策产生的战争便是民族解放战争。在两大压迫者集团进行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战争中，鼓吹“保卫祖国”是完全欺骗人民的。只有遭受民族压迫的国家，为反对实行民族压迫的国家，提出“保卫祖国”才不是欺骗人民的；社会主义者决不反对被压迫民族在这种战争中“保卫祖国”。

从一七八九年到一八七一年，欧洲这一特殊时代发生的一切

战争，并不都是民族解放战争。其中也有殖民战争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反动的帝国之间的战争。由先进的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新时代，如果说只能发生帝国主义战争，也是一种荒谬的论断。

在民族自决问题上，至少可以分为三类不同的国家：第一类是已经经历过民族运动的西欧先进国家，在这里，提到历史日程上的问题，已不是从封建主义过渡到民族进步和政治自由，而是由过时的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类是正在经历着民族运动的东欧国家，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民族运动尚未完成，“保卫祖国”还能起保卫民主、保卫祖国语言和政治自由以及反对压迫民族和中世纪制度的作用；第三类是多半在将来才会经历民族运动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

社会主义者不能反对一切战争。在帝国主义世纪充满着殖民地战争。帝国主义正在加速最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由此必然得出的结论，是帝国主义往往要产生民族战争。国内战争也是一种战争。在任何阶级社会内，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继续、发展和尖锐化的自然表现；而且，在一定情况下是它的必然表现。获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一下子排除一切战争；它必然会引起各国资产阶级扑灭它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方来说是合理的正义战争。一切压迫阶级总是拥有武装的，被压迫阶级必须学会掌握武装。资产阶级用武装镇压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只有解除资产阶级的武装之后，才不会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只有彻底战胜和剥夺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之后，才能最后制止战争的发生。

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怎样评价战争呢？主要的问题是要弄清战争是由什么引起的，是由哪些阶级准备和进行的。我们的目的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使战争不可能再发生，但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尤其不能否认

命战争的可能性，即由阶级斗争所产生、由革命阶级所进行并具有直接革命意义的战争。

俄国革命的经验与十八世纪末开始的欧洲革命经验是完全一致的。国内战争是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一系列经济上、政治上的冲突斗争，经过不断地重复、集中、扩大和尖锐化，最后变成一个阶级拿起武器反对另一阶级的斗争。武装起义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要依靠先进阶级，在全国范围内争得人民的多数；二、要依靠全国人民的革命高潮，旧政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彻底破产；三、中间分子阵营内已经发生大动摇。武装起义是受特殊规律支配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斗争形式。必须遵循马克思指出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以下规则：一、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起义当作儿戏，起义一开始就必须把它进行到底；二、必须在决定的地点和决定的关头集中很大的优势力量，否则就会被更有准备和更有组织的敌人把起义者消灭；三、起义既已开始，就必须以最大决心行动起来，并坚决转入进攻，“防御是武装起义的死路”；四、必须在敌人分散的时候，出其不意地袭击他们；五、每日每时都必须取得胜利，即使是不大的胜利，无论如何要保持“精神上的优势”。武装起义最重要的战术原则，是勇敢，勇敢，再勇敢！

武装起义也是一种战争。一切战争无不使用暴力，但必须分清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分清战争的性质是反动的还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反对对民族使用暴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赞成革命战争，最根本的问题是战争的阶级性。决定战争的性质不是看谁先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是看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战争是哪一种政策的继续。如果是资产阶级两个集团为瓜分世界、为掠夺和征服弱小民族进行的战争，那就是反动的帝国主义战争。只有弄清战争的性质，才能决定对战争的态度。

……在实践上，在奴役性的、农奴制的大地产占优势而实现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生产的物质条件尚未具备的地方，这可能是把土地转归小私有农民阶级掌握；而在民主革命完全胜利的条件下，就可能是实行国有化；也可能是把巨大的资本主义地产转交给工人协会，因为我们将立刻由民主革命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并且恰恰是按照我们的力量，按照有觉悟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

列宁：《社会民主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221页。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农民运动恰恰不是社会主义运动，而是民主主义运动。农民运动在俄国也象过去在其他国家一样，是按自己的社会经济内容来说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的必然伴侣。它绝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反对商品经济，不反对资本。正好相反，它反对农村中的各种旧的、农奴制的、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反对农奴制一切残余的主要支柱——地主土地占有制。因此，这种农民运动的完全胜利是不会铲除资本主义的，恰恰相反，它给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更广泛的基础，加速和加强纯粹资本主义的发展。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只能造成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支柱，在这个共和国内，无产阶级直接公开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将第一次展开。

……目前俄国的农民运动所追求的是什么呢？土地和自由。这个运动的完全胜利将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获得了自由，它就会推翻地主和官吏在管理国家方面的统治。如果获得了土地，它就会把地主的土地转交给农民。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充分的对地主的剥夺（夺去地主的土地）是否会消灭商品经济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充分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灭农户在村社土

地上或在“社会化了了的”土地上的个体经营呢？不，不会消灭。最充分的自由和最充分的对地主的剥夺，是否会消除拥有许多牛马的富农和雇农、短工之间，既农村资产阶级和农村无产阶级之间的鸿沟呢？不，不会消除。恰恰相反，上层等级（地主）被粉碎和消灭得愈干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敌视也就愈益加深。农民起义的完全胜利将有怎样的客观意义呢？这个胜利将会彻底消灭农奴制的一切残余，但是决不会消灭资产阶级的经营方式，不会消灭资本主义，不会消灭社会分为阶级、分为富人和穷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现象。为什么目前的农民运动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呢？因为它消灭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建立民主的社会制度，并不改变这个民主社会的资产阶级的基础，并不消灭资本的统治。觉悟的工人、社会主义者对于目前的农民运动应当抱什么态度呢？他们应当支持这种运动，最积极地彻底地帮助农民把官吏和地主的政权完全推翻。但是他们同时应当向农民解释，仅仅推翻官吏和地主的政权还是不够的。在推翻这个政权的同时，还应当准备去消灭资本的权力，消灭资产阶级的权力，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立即宣传完全社会主义的学说即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并且联合、团结和组织农村无产者去同农村资产阶级以及俄国整个资产阶级作斗争。觉悟的工人能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的斗争而忘掉民主主义的斗争，或者因为民主主义的斗争而忘掉社会主义的斗争呢？不能，觉悟的工人之所以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正是因为他们懂得这两种斗争的相互关系。他们知道，除了经过民主主义，经过政治自由以外，没有其他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此，他们为了达到终极的目的社会主义，就力求完全而彻底地实现民主主义。为什么民主主义斗争的条件和社会主义斗争的条件是不一样的呢？因为在这两种斗争中，工人的同盟者必定是不同的。民主主义斗争是工人同一部分资产阶级，特别是同小资产阶级一起进行的；而社

会主义斗争则是工人反对全体资产阶级的斗争。反对官吏和地主的斗争,可以而且应当同全体农民,甚至同富农、中农一起进行。而反对资产阶级 同样也反对富裕农民 的斗争,却只能同农村无产阶级一起才能可靠地进行。

列宁:《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1905年)·《列宁全集》第9卷,第428—431页。

普列汉诺夫的“土地平分”的观点,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清楚地说明,社会民主党人一开始就提出了他们至今还一贯坚持着的俄国土地问题的理论原理。

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他们的党诞生之日起直到现在,始终捍卫着以下3个原理。**第一**,土地革命必将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从农奴制盘剥关系下解放农村,将是这个革命的内容。**第二**,行将来临的土地革命,按其社会经济意义来讲,将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它不会减弱反而会加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阶级矛盾的发展。**第三**,社会民主党有充分根据以最坚决的态度支持这个革命,并且规定一些当前的任务,它决不给自己定出什么限制,甚至对“土地平分”也决不拒绝给以支持。

列宁:《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1906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140页。

……农民群众最关心的是土地问题。农民现在已经成为工人在革命中的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同盟者。……

人民,首先是农民,希望什么?农民希望得到土地。这是谁都知道的。农民要求国家的全部土地归农民所有。农民希望摆脱地主和官僚的压迫。农民所希望的就是:夺取地主的土地,使他们不再强迫农民服工役,即实质上等于从前的劳役;夺取官僚的政权,

使他们不再虐待普通人民。因此工人应当帮助农民进行争取土地的斗争,帮助他们直接地、明显地和十分确切地提出土地问题。

列宁:《杜马中的土地问题》(1906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384页。

布尔什维克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正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只有农民才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可靠的重要的同盟军(直到这个革命胜利为止)。农民也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但是它的“色彩”却与立宪民主党人或十月党人完全不同。不管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否愿意,历史是向它提出了对待俄国“旧制度”的真正革命的目的。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不得不反对地主政权以及它与它相联系的旧的国家政权的基础本身。客观条件没有“强迫”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用全力去保存旧政权,用同旧政权妥协的办法去完成革命。因此,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按其不得不行动的倾向来看,是革命的民主派。布尔什维克确定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策略是:无产阶级必须领导农民,但不是同他们合并,必须领导农民反对旧政权和旧制度,麻痹在人民自由和旧政权之间摇摆不定的自由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和动摇性。

列宁:《普列汉诺夫同志是怎样论述社会民主党的策略的?》(1906年)。《列宁全集》第10卷,第433—434页。

一切社会民主党人都深信,我们的革命,按它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内容来讲,是资产阶级革命。这就是说,变革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进行的,而且变革的结果必然正是这些生产关系的进一步发展。简单地说:即使取得了最完全的自由,即使农民在争取土地的斗争中获得了最彻底的胜利,整个社会经济仍然要受市场和货币的支配。争取土地的斗争,争取自由的斗争,就是